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翻译研究中的 性别视角

GENDER PERSPECTIV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穆雷等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翻译研究中的 性别视角

GENDER PERSPECTIV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穆雷等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研究中的性别视角/穆雷等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8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ISBN 978-7-307-06049-4

I. 翻… II. 穆…[等] III. 翻译—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5363 号

责任编辑:谢群英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詹锦玲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4.375 字数:235千字 插页:2

版次: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6049-4/H·545 定价:23.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穆雷，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院长、翻译学研究中心主任、全国翻译研究资料中心主任。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翻译》编委、香港翻译学会终身会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比翻译研究会副会长/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译协/广州市译协/广州市外事翻译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编委，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翻译教学、比较文学等。曾在国内权威或核心期刊与国外发表研究论文一百余篇，参编各种论文集、辞典、教材等多部。多次获得各种科研奖励。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is a repeating floral pattern in a light beige color on a reddish-pink background. The pattern consists of stylized flowers, leaves, and scrolling vines. In the center of the page, there is a solid reddish-pink horizontal band. Within this band, the text is centered. Two small black dots are positioned on either side of the text, connected to the central band by thin horizontal lines.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级出版基金项目



序 言

作为一名女性,在自己的工作和研究中难免遇到种种与性别相关的问题,产生一些疑问与想法。例如,为什么古往今来人们都用女人或与女性相关的表述来比喻翻译?为什么翻译与女性一样被置于从属的甚至被忽视的地位?为什么一些女性翻译家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是女性或者不愿意承认自己具有女性意识?……这些疑问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促使我们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发生浓厚的兴趣,产生进一步探究的愿望。特别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包括在阅读研究文献与作品/译品的过程中,在与翻译家和翻译理论研究者的接触交谈过程中,在与同学同行的辩论交流过程中,不断感受到来自传统观念、来自男性视角、来自学术内外的各种压力与挑战,当然也有来自女性与男性研究者的理解与支持。同时我们更加体会到从性别视角看问题的不可替代性与必要性,体会到性别视角对于女性学者成长的学术意义,也体会到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发展过程的艰辛。

我们对国外翻译理论,从翻译介绍到综述批评,再到借鉴发展,做本土化研究,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开始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如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等,然后开始把这些现象联系到一起来思考,探究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理论?为什么这些理论首先发生在西方学术界?女性主义理论是如何与翻译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在这样的结合点上有哪些可以研究的课题?解决这些问题对推动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的发展有何作用?等等。我们逐渐产生了更加深入研究的愿望,那就是看看在中国的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中,是否存在女性主义的意识 and 视角?从女性主义到性别研究其发展历程对学术研究有何影响?为什么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受到诟病?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其优势与不足何在?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其发展前景与方向何在?等等。这本书就是要回答上述问题,同时它也反映出近年来我们对此问题探究的心路历程。在尝试解答自己与他人提



出的问题时,又不断发现新的问题,寻求新的方法与答案,同时也体验着新的愉悦,承受着新的压力,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此过程中,研究有了新的进展,我们也随之成长了。

作 者

2008



目 录

序 言	1
-----	---

第一部分 女性主义、性别与翻译

第一章 女性主义、性别与翻译在西方的发展与现状	1
一、关键概念	1
二、女性主义、性别与翻译的结合	6
第二章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中国	16
一、中国与女性主义	16
二、中国语境下性别与翻译的结合	18
三、本章小结	27

第二部分 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

第三章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忠实	
——以朱虹译《并非梦幻》为例	29
一、忠实观综述	29
二、从女性主义视角批判传统忠实观	33
三、在女性主义浪潮中重构翻译的忠实观	40
四、女性主义视角下朱虹译《并非梦幻》所体现的忠实	46
五、本章小结	57
第四章 女性主义观照下的译者主体性	60
一、译者主体的发现	60
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译者主体正名	62



三、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彰显女性/译者身份	64
四、《荒山之恋》英译案例分析	67
五、本章小结	74
第五章 女性主义翻译实践	76
一、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相关概念	76
二、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实例:加拿大	79
三、中国:女性主义翻译实践 ——以《阴道独自》两个中译本为例	82
四、本章小结	97
第六章 女性主义译作评论	98
一、女性主义译作评论相关概念	98
二、女性主义译作评论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	100
三、女性主义译作评论个案综述	101
四、从女性主义视角重读 <i>Daughter of the River</i>	105
第三部分 性别研究与翻译	
第七章 翻译中的双性同体	120
一、性别、双性同体与翻译	120
二、译者的双性视角之理论探讨	129
三、译者的双性视角之案例分析——翻译性别她(他)者	133
四、译者的双性视角之小结	138
第八章 从双性同体到主体间性	140
一、双性同体的主体间性意义	140
二、译者主体间性之案例分析——译者的多重视角	142
三、本章小结	144
结 语	148
后 记	150
附录一 国内发表的女性主义翻译的论文与书籍	154



附录二	与女性主义翻译相关的部分学位论文·····	166
附录三	心弦——女翻译家金圣华教授访谈录·····	169
附录四	翻译界:男性的一统天下? ——香港女翻译家孔慧怡博士访谈·····	176
附录五	翻译与女性文学 ——朱虹教授访谈录·····	183
人名术语对照表·····		191
参考文献·····		198

第一部分 女性主义、性别与翻译

自 20 世纪 90 年代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以来,从文化视角进行的翻译研究日益深入,结出了累累硕果。女性主义、性别与翻译的结合正是这次转向后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联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翻译研究一个日益突出的发展方向。本部分简要介绍女性主义及性别概念的发展,重点探讨二者与翻译的结合在西方和国内的发展状况。



第一章 女性主义、性别与翻译 在西方的发展与现状

1

一、关键概念

1. 女性主义 (feminism) ①

feminism 一词源自法语 femme(女人、妇女)。1882 年法国争取妇女投票权运动的活跃分子雨蓓汀·欧克雷(Hurbertine Auclert)在她出版的期刊

① 在中国有学者将 feminism 译作“女权主义”,也有人将之译作“女性主义”,甚至“女权/女性主义”。本书无意对二者进行区分,在绝大多数地方将采用“女性主义”这一译法。关于“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这两种译法有何侧重,孰优孰劣的相关探讨参见:施旻,2004,英语世界中的女性解构[M]。北京:九州出版社,34-41;王润清,feminism 的释义[J/OL]。两性视野,<http://www.alleyeshot.com/0635.htm>,2006-4-11/2006-4-11;沈奕斐,2005,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84-85;黄丹麾,2004,女性主义与女性艺术的困惑[J]。美苑(2):12-13;等等。



《女市民》(*La Citoyenne*)上首次自称为“feministe”(女性主义者)。之后不久,feminism(女性主义)一词便开始出现在英文中,成为妇女解放运动者自我指涉的符号。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和思潮的发展,女性主义不断获得新的内涵和外延,有学者指出:“女权/女性主义有别于其他各种主义,它不是由几条定义和一系列连贯的概念组成的一种固定不变的学说,更不是排斥异己,追求占据霸权地位的‘真理’,而是开放的、动态的、涵盖面极广的各种思想交锋与交融的结果”(王政,1998:9)。因此,对女性主义的任何定义或理解都只是当下的、历史的、某一语境中的。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这些定义和理解都将被不断修订,甚至否定。鉴于此,与其给女性主义一个简短的定义,不如将女性主义的发展简要地呈现出来,让读者在回顾女性主义发展的历史中更好地理解女性主义的丰富内涵。

2

总体而言,女性主义包含两种基本形式——“女性主义实践和女性主义理论”或“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研究”(吴小英,2000:4)。女性主义实践/运动就是“妇女为争取与男性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平等权利,将自身从父权制文化及制度的压迫和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而进行的运动和斗争,又称妇女运动或女权运动。它既包括政治运动本身,又包括运动所依据的意识形态主张”(同上:5)。而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是主要“致力于性别差异和不平等的根源、结果及解决途径的理论解说,以及期望给性别关系带来深刻变化的社会与文化变革及重建工程的努力”(同上)。它是妇女运动的理论基础,是以“妇女运动为社会来源的女性主义学术思潮”(同上)。因此,女性主义实践/运动是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反过来影响甚至引导女性主义实践/运动的发展。

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渊源一般认为可追溯到法国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随着“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观念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肯定,一些妇女提出了享有与男子同等权利的要求。18世纪90年代,著名女活动家玛丽·戈兹(Marie Gouze)以《人权宣言》为蓝本,发表了被称为《女权宣言》的妇女权益十七款,主张自由平等的权利不能只限于男性。1791年,英国作家玛丽·沃斯冬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著《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为争取妇女的教育权与社会地位平等而呼吁,成为“世界女性运动的鼻祖”。

在西方历史上,女性主义经历了三次浪潮,这其中既有女性主义运动的



风起云涌,也有女性主义理论的日益丰富和多元化。^①

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发生在19世纪中叶,落幕于20世纪20年代,基调是“权利”问题。在这一浪潮中,妇女从要求改善和增加她们在就业、教育、政治和家庭中的地位与机会出发,逐渐集中于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斗争。自由女性主义理论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流派,主张“将过去大多仅仅与男性连在一起的与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有关的价值扩大到女性中间”(李银河,2005:40)。这次女性主义运动成绩斐然,当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进入尾声时,越来越多的妇女获得选举权,女性教育广泛开展,女性就业增加。但是,由于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主要是社会改良型的,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父权制社会的结构,也没有改变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

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②,规模宏大,涉及各主要发达国家。当时女性主义者认识到“虽然女性有了选举权、工作权和受教育权,但是表面的性别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性别不平等”,因此,她们将该女性主义浪潮的基调确定为“消除两性差别,并把这种差别视为造成女性对男性从属地位的基础”,将其主要目标定位在“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权力”之上(李银河,2005:26)。法国作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到来之前出版的《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指出了女人被社会塑造的过程,对此次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批判了生理决定论,猛烈抨击了关于女性的“神话”——“女人的最高价值和唯一使命就是她们自身女性特征的完善……而这种本性的完美,只存在于由男人主宰一切、女人在性方面温顺服从和对孩子的母爱之中”(转引自李银河,2005:30)。该书引发了人们对传统女性角色的重新思考,成为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中的纲领性文件和宣言。此次浪潮中的代表理论有主导60年代的激进女性主义理论和流行于70年代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前者主张女性是被压迫的阶级,必须消灭男权制才能消除对女性的压迫,该理论甚至还极力颂扬女性气质,宣称女

① 也有人认为西方历史上只发生了两次女性主义浪潮,即第一次和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而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反本质主义与前两次浪潮相比,还不足以被称为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

② 也有某些学者认为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止于20世纪70年代。



性优于男性;而后者则认为女性问题在工人运动、社会民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女性解放的根本途径是进入社会主义劳动市场(李银河,2005:52)。在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中,妇女争取到男女同工同酬及流产合法化的两个胜利。伊·巴丹特尔(Elisabeth Badinter)认为,“如果人们还将父权制定义为妇女生育的控制和职责的社会分工的话,那么最近20年的显著特征乃是妇女之双重胜利:对其生育的支配以及与男人们对经济世界的分享”(1988:162)。不仅如此,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还带来了人们观念上的深刻转变,大大改善了妇女的生活状况,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它不是在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之后”产生的女性主义发展高潮,而是“针对”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而发生的(Mann and Huffman,2005:57),是建立在对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中的本质主义和忽略妇女间差异的批判之上。“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这一说法由黑人和少数族裔妇女(women of color and ethnicity)首次提出(Springer,2002:1063)。虽然在该浪潮中女性主义运动涉及面更为广泛,层次也更为深入,有时直指语言和知识本身,但该浪潮主要是以一种创造出新思维、新知识和新范式的性别话语形式出现的。它消解了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中心,推进并重新塑造了女性主义运动,使之更加全面、多元。在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中活跃着四种女性主义流派,即交互作用理论(intersectionality theory),后现代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又称全球女性主义)及新生代女性主义的纲领(Mann and Huffman,2005:57)。它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包括差异、解构和消除中心。

上面提到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除此之外,女性主义理论还包括多元文化与全球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心理/精神分析和社会性别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等等。尽管流派众多,主张各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但各派女性主义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消灭两性间的不平等”(李银河,2005:36)。在这一目标的引导下,女性主义不断发展,吸收各种理论和力量,不断以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2. 社会性别(gender)

这里的“性别”指的是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性



别”(gender)概念^①。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该概念就一直是女性主义的核心与精髓,它与生理性别(sex)相对应,指“性别的社会构成”(李小江 2005:166)。它是一种由生物自然属性所引起的社会存在,是由“一定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赋予不同性别的人一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男女身份做出的不同的价值评判”(梁巧娜,2004:7)。早期的女性主义者用该概念指将年青女性(young female)变成符合某一时代内某一文化所要求的女人的社会塑造过程。20世纪70年代随着社会性别概念的普及和发展,社会性别理论走出了仅关注女性社会身份构建的局限,形成了社会性别研究。人们认识到社会性别是人类组织性活动的一种制度。同任何文化中都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一样,任何文化中也都有自己的社会性别制度,也就是说,各种社会体制、习俗把人不断地组织到规范好的“男性”“女性”的活动中去。在此种认识的关照下社会性别研究得到了扩展,不但包括对女性的研究,也包括对男性的研究,还包括对同性恋、双性恋等的研究;它不是完全以妇女为主体和目标的研究,而是由两性/各性别共同参与的研究。伴随着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研究者不仅思索并挑战社会体制、习俗对性别的塑造,他们还开始质疑在传统文化中形成的所谓“无性别”的知识体系。“他们审视的目光不仅看到妇女在知识体系中的缺失和贬抑,还看到了知识生产中的社会性别权利关系,看到了社会性别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基本组织原则是以往学界研究所忽略的,看到了由这种忽略导致的人们作为常识接受的许多理论的偏颇和谬误,看到了这些偏颇和谬误在巩固妇女从属和边缘地位中的巨大作用”(沈奕斐,2005:121)。于是“作为思想和文化运动的实践,女性主义学者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开始了认真细致的清理,把社会性别理论的棱镜引进历史、文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一系列学术领域”(王政,2003:28)。社会性别开始成为一个和阶级、种族相类似的分析范畴,“引发了社会生活乃至科学领域中一场全方位的革命”(李小江,2005:3)。由于社会性别起源于女性主义,在女性主义运动和理论中得以发展,因此今天在学界被广泛运用的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和理论很大程度上就是

^① 有人将 gender 译作“性别”,将 sex 译作“性”,也有人将 gender 译作“社会性别”,将 sex 译作“性别”。关于该词译介的相关探讨参见李小江:女性性别的学术问题[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166-170。



女权主义理论(同上:169)。

3. 翻译与翻译研究

翻译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文化活动。可以说,翻译活动始终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翻译实践相比,翻译研究的历史要短得多。而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理论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形成。

当代翻译研究以“文化转向”为分割点,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尤金·奈达(Eugene Nida)、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约翰·卡特福德(John Catford)等为代表的语言学派研究者一改传统译论中随感式的研究方法,将大量语言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中,系统探讨了翻译单位、语言转换、对等、翻译类别等问题,极大地推动了当代翻译研究的发展。但是,他们的研究只关注翻译所涉及的文本,而将文本与文本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割裂开来,因此只能揭示翻译中与语言转换相关的问题,而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社会历史意义等缺乏启示作用。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 Even-Zohar)和基迪恩·图里(Gideon Toury)等人的系统理论开始扬弃规定性的研究方法,将语言学和文艺学结合起来,既描述翻译所发生的社会、文化、文学背景,又对文本进行描述性分析,启发了译学研究者以新的方式看待翻译、文化和历史的关系。翻译研究者们将目光转向:一个文本是怎样被选定和翻译的?译者在文本选择中的作用是什么?编辑、出版商、赞助人扮演着什么角色?什么决定了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译本是如何在目标文本中被接受的等问题(Bassnett, 2004: 123)。1990年,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和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他们合编的《翻译、历史和文化》(1990)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发出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呼吁,成为翻译研究正式“转向”的标志。在此之后,人们关注的焦点越来越转向翻译的文化本质,“意识形态”、“权力”、“操控”等成为翻译研究中最热门的关键词。

二、女性主义、性别与翻译的结合

在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到来之前,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似乎都是“无性的”。无论翻译是被看做信息在不同语言间的转换,还是一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产物,无论译者是被看做机械的搬运工,还是起能动作用的阐释者



和再创造者,性别与翻译似乎毫不相干。

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性别与翻译一直以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植根于父权文化的传统译论中,翻译被视为从属、派生和背叛,被不断贬低到女性的地位。约翰·弗洛里奥(John Florio)在1603年就曾发出感慨:因为必定存在缺陷,翻译是公认的女性(转引自 Simon, 1996:1)^①,昭示出父权文化对翻译与女性的双重贬抑。1654年法国翻译评论家吉尔·梅纳日(Gilles Menage)杜撰的双关语“les belles infidels”,即“不忠的美人”或“漂亮而不忠实的译文”,更以其巧妙地将译文与女性统一起来,将译文的背离与女性的背叛结合起来,赢得了后世无数翻译评论者们的颂扬和反复引用。我国译论中的“处女”与“媒婆”之争又何尝不是建立在父权文化的性别制度之上?在翻译被贬低为女性之时,译者也无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女性的印记,成为原作者的“女仆”、“情人”和“妻子”。

然而,正是因为翻译和译者所处的女性地位,从中世纪开始直到20世纪,欧洲妇女才被允许通过翻译公开表述,才因此进入文化调停者的角色。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不少女译者脱颖而出,如玛格丽特·泰勒(Margaret Tyler)、阿芙拉·本(Aphra Behn)、杰美茵·德·斯达尔夫人(Germaine de Stael)等等,但是翻译中的性别问题并没有进入人们的研究视线。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蓬勃发展时,翻译中的性别才引起人们的关注。女性主义者们开始为“被千百年来父权意识形态粗暴地贬低到女性的从属地位,无端地受到了不白之冤”的翻译洗刷冤屈(王东风,2003:16),并借此达成批判性别歧视、树立女性主体地位的诉求。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主义语言观是性别与翻译结合的基础。

1. 女性主义影响下的语言观

女性主义者在寻求反抗和颠覆父权统治的进程中,大量借鉴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后者对宏大叙事和主流话语的颠覆与女性主义不谋而合,法国后结构主义大师福柯(Foucault)的权力/话语学说,更是让女性主义者们幡然醒悟——女性之所以沦为第二性,是因为女性没能掌握话语权;现行的主流话语是男性的话语,言说着男人眼中的世界,并为男权服务;在现行话语中,女性永远都言说不了真正的自我,永远都是“他者”、是第二性(黄华,

^① 本书中引用的所有英文资料均由笔者翻译。